

■聚焦 潘向黎中短篇小说集《白水青菜》：总有一些情愫值得恒久期待

□潘凯雄

这是一部新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但却不是潘向黎近几年中短篇小说新作的首次集结。全书收录作者中短篇小说凡14篇，最早的《如果在箱根做梦》创作于1995年，最晚的《女上司》则收笔在2006年。这就意味着《白水青菜》中所收录的最新作品距今也有14年了，而且这些作品在十来年前既分别于文学期刊上发表，也先后由不同的出版社集结出版过，尽管不同集子所收录的具体篇目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白水青菜》这部集子呈现的仅仅是潘向黎14年前的创作状况。这以后在我的印象中，向黎除在2010年出版过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穿心莲》外，其编辑工作之余的主要创作精力都集中在文化随笔与古诗词赏析的写作。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了。

老实说，收在《白水青菜》中的大部分作品以前我分别都读过，而现在令我产生写作本文冲动的缘由由就是两个字：好奇。

本人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多年文学出版经历的从业者，自然深谙出版方对文学作品这类选题的选择是十分谨慎的。不是因为作品本身的质量，而只是因为市场；而市场的选择，品质又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倒是时时为一种莫名的“喜新厌旧”感梦魇般地缠绕着。在出版方自负盈亏的大背景下，没有几家财大气粗的出版社能不考虑自身经营的平衡。于是，我之好奇就是想“窥探”一下出版方看中向黎这部“旧作”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向黎这部“旧作”中的什么魅力打动了出版方？

抱着这样的好奇，我重读了《白水青菜》中的14篇作品。我得承认，这次的整体阅读与以往的零散阅读其感受的确不完全一样。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看完《白水青菜》这个单篇后自己的第一直接感受就是一个“馋”字，当然也十分佩服我们“老潘家”这位青年作家的生活洞察力和文字穿透力好生了得。而本次14篇作品连续读下来，“馋”字已不是那么重要，倒是向黎那个阶段的创作更多了一些认识上的整体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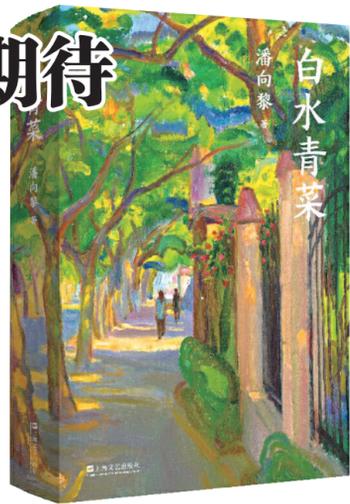
收录在《白水青菜》中的14篇小说，在皮相上至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共性元素：比如场景皆为都市，无论地域是在国内还是境外；比如背景多在当下，即便镜头往远推，也不过只是闪回一两年前前的场景；比如主题均不离爱情，14篇小说就是14个“Love story”，但又各不相同：有女比男大许多者，也有男比女大少者；有一方有家庭一方没有者，也有双方皆有家庭者；有爱情那层窗户纸被捅破者，也有情感只是暗藏默默注视者……在向黎的笔下，爱情虽

然涵盖了多种可能，但又都不那么容易。哪一种爱情都不那么容易，这就对了。在当下这个高度物质化、趋利化的社会环境下，爱与被爱的纯度在稀释难度上却在增加。房子、位子、票子、车子……这些纯物质的因素变成了爱与被爱的紧密附着物，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又有多少人能够抵御这些爱之外的物质附着？其实导致哪一种爱情都不那么容易的因素又何止是物欲的干扰，爱的自信也在随之磨损，不信任地久天长，就怕朝朝暮暮，这种精神状态下对爱的投入度自然可想而知；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爱的随意却在涨潮，不求相互创造，大不了“另起炉灶”……

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的不易，再来看《白水青菜》中的14篇小说，其珍贵价值就凸现出来。在谈到自己的新版作品集时，向黎如下两段“自述”我以为恰是读者进入理解她这时期作品之门的钥匙：“我的小说反反复复讲述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这个向往我是很死心眼的，而且笔下所有人物都非常死心眼，百折不挠，一心朝向理想无限靠近。”“我总希望对人存有善意，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困境，貌似绝境，也希望能有些余地，留些祝福。”

短短的两段话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理想、善意。其实，细读《白水青菜》，还可以从中抽象出纯净、宽厚、执著这样一些贯注于14篇作品中的主题词。《无梦相随》中的奚宁、《十年杯》中的班长程方、《如果在箱根做梦》中的砚青、《牵挂玉米》中的玉米（郁林）江至柔和那个送盒饭的男人、《轻触微温》中的秋子和阿瞳、《我爱小丸子》中的姜小姜、《缅桂花》中的纪蒙北和许伊、《奇迹乘着雪橇来》中的“她”、《他乡夜雨》中的芳野绫子、《绯闻》中的江秋水、《永远的谢秋娘》中的谢秋娘、《一路芬芳》中的李思锦与姜礼扬、《女上司》中的钟可鸣和《白水青菜》中的妻子，这些个角儿，无论男女，在他们身上，莫不程度不同地烙上了理想、善意、纯净、宽厚、执著这样的印记；而由他们分别演绎出的14个“Love story”确实就是在“反反复复讲述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

现实之不足，只好寄望于理想。这是浪漫主义文学出现与存在的根基，也是其最重要的艺术表征。在这个问题上，向黎不仅自己“死心眼”，而且还让自己“笔下所有人物都非常死心眼，百折不挠，一心朝向理想无限靠近”。如果不能理解与吃透作家这样的艺术初衷，那么顺理成章的一个逻辑必然会认为作品的“虚”与“假”；反之则是强烈地感受到作家这样一种主



观性极强的创作意图在《白水青菜》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样一种艺术表现及理想也并不怎么新鲜，在类型化的言情小说中这样的艺术表现当不鲜见，那些作品中的男男女女们爱起来同样的非常“死心眼”。的确，如果仅从“爱”这一个字来看，这样的认定也不是毫无依据。但在我看来，比较《白水青菜》中的诸篇作品与那些言情小说，一个最明显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向黎笔下的作品与人物是高度个性化与艺术化的，而类型化的言情小说则是走向趋同与共性。向黎笔下的每篇作品尽管在表现“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无限向往”这一个点上高度趋同，但这本身就是向黎创作这些作品的初衷之一。除这一点之外，《白水青菜》中的14篇作品，在情节设置、故事走向、人物性格、文字的讲究和叙事调性上都表现出高度的艺术个性，许多篇什不到结局完全吃不准会是个什么结果，这和那些类型化的言情小说绝对有天壤之别。

行文至此，我对向黎这部“旧作”究竟凭什么魅力打动了出版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案，除去个性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之外，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爱”的理想、善意、纯净、宽厚和执著这些个印记始终鲜明而顽强地烙在不同的主人公身上。尽管对“爱”的这些个情愫在当下十分之稀有甚至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内心与潜意识中对这些可以统称为美好、纯洁的情愫没有憧憬和期盼，在一定程度上，向黎完全可以做到：缺失愈多期待愈烈。

总有一些情愫值得恒久期待。正是这样的情愫再配上精致个性的艺术表现，这就是出版方看中向黎这部“旧作”的理由之所在，也是向黎《白水青菜》的生命力得以持久不衰之妙谛。

以人的转变为脱贫攻坚赋义

□杪 椽

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琵琶围》（《人民文学》2020年第9期，江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以赣南山区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小山村琵琶围，以扶贫干部工作的进展为主线，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山村脱贫致富的全过程。小说将对扶贫和脱贫现场的审美建构放置在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化与世情之中，在为时代精神和人物理想化的性格形象接续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人的转变为脱贫攻坚赋予了历史意义。

尽管是从“扶”的视角入笔，但《琵琶围》以扶贫与脱贫双线并行，将脱贫作为扶贫的目标，通过脱贫反映扶贫的成果，在群众脱贫的过程中彰显扶贫干部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同时写出了群众在扶贫干部的努力下获得启发和鼓舞之后迸发出的主体性力量，在内容和主题上避免了“扶贫记”或“脱贫记”式的简化书写，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活态化的脱贫攻坚现场。从叙事而论，《琵琶围》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孤悬于群山之中、住户不多的小世界，更有利于充分表现故事、人物和主题。进入小说中，会感觉到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左右夹攻，一股来自扶贫一方试图尽快让仍然留在山高路险、山多地少的琵琶围的村民搬迁和脱贫，以完成驻村帮扶任务的迫切心情；另一股源于琵琶围人因袭传统生活方式、不思奋斗，“等着别人送小康”的僵化思想和陈腐观念。作者让临危受命的何劲华和金彩凤将说服绰号“两斤半”的酒鬼加懒鬼石浩财作为扶贫成败的关键，即明确落实扶贫政策仅仅是脱贫攻坚的外部条件，彻底告别贫困的根本在于人的转变，因此小说将对人的工作作为叙事的核心目标。帮扶者将村民当作自己的亲人，收获了感动和信任，琵琶围人改变贫困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因此被激发出来，两股力量合成了一股力量，通过易地搬迁安置和发展特色产业摆脱了贫困，两股力量从最初的排斥到最后的统合，既是脱贫攻坚的真实过程，也在叙事中形成了打动人心的张力。

以“进入者”的身份来到琵琶围，扶贫干部如何走进群众心中并得到信任，是作者为凸显人物性格形象设定的“过关题”。何劲华和金彩凤是被单位紧急抽调的“编外”驻村队员，而真正的队员杨明和镇帮扶干部则被石浩财赶出了琵琶围。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传统代表着传统价值，可以打通贫困户心灵壁垒的传统文化作为人物生存土壤和进入农户的“敲门砖”，既为人物性格形成提供依据，也为人物完成扶贫使命奠定基础。小说所要表达的传统价值和时代精神分别寓托在两人身上，琵琶围的老人橘子婆和哑巴则是传统价值的化身，他们经历过红军时期的风刀雨剑，为革命作出过贡献，因为身世成谜而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但

他们从未泯灭对信仰的坚守和对精神的守望。何劲华和金彩凤无疑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他们的出场带有身份转换的戏剧性，他们本不是驻村队员，而是琵琶围点名要求后被单位派去解决问题的。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任务，因此自觉克服个人和家庭的困难进村入户，最终帮助琵琶围人实现了搬迁安置和脱贫致富。作者将何劲华作为万千扶贫干部群体的典型代表，着力赋予了他近乎完美的道德人格和理想情怀。

在扶贫与脱贫的进程中将传统精神和时代价值融为一体，在脱贫攻坚中实现文化逻辑上人的转变，也是小说最重要的叙事逻辑。将传统价值作为时代精神的立身之基，是小说核心的价值立意，正是基于此而在群众心中形成的新的生活理想和思想观念，才促使琵琶围人告别先前的思维定式和陈旧生活方式，先发出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的内生力量。其中，石浩财、许秀珍等形象作为扶贫叙事线上主要的“对手”角色，其思想和态度的转化佐证了扶贫工作策略的有效性。石浩财在何劲华的帮助下，从一个丧失生活信心的醉鬼、懒汉一步步走上正途，并在后期兴办产业的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他的经历上演了一出由悲而喜的扶正剧。许秀珍亦是在新观念的影响下从“青皮寡脸、尖酸刻薄”变得“自信大方、甚至可亲起来”的人。共产党员石养财更是受到感召主动提出让贫困户建档。哑巴写有“红军万岁”的搪瓷缸、何劲华挂在腰上不离身的笛子和他制造的精美灯彩，以分别代表着传统和当下的意象贯穿叙事的全过程，它们作为蕴含着强烈的情感和情绪指向的符号，承担着使人物行动向意义转化的功能，是极具艺术化的修辞表达。

作为乡村叙事的变体，脱贫攻坚叙事仍然建立在乡村叙事的基础上，只有熟悉乡村在新时代出现的新变化，了解脱贫攻坚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政策，体悟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才能写好这类作品。当下的乡村，既不是《创业史》时代的乡村，也不是《白鹿原》里的乡村，而是充满无限变化和生机的乡村，需要写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加以观察和理解。《琵琶围》标示出作者对这一题材的理解力和把控力的同时，也显示出对当下乡村的熟悉程度。曲折的故事和动人的情感建立在隐秘的乡村伦理、宏阔的地理风物和精致的习俗器物之上，大到山川河流，小到人的一颦一笑，并深度切入人在传统乡土文化滋养下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以人的转变写出了困难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绘出了一幅党的政策、扶贫干部、社会力量和困难群众合力进行的充满豪情和火热干劲的脱贫攻坚图画，勾勒出了步入小康社会后的美好生活蓝图，使人看到了乡村的希望和未来，可谓同类书写中的一部佳作。

用非虚构写好中国故事

陈玉福《治沙愚公——中国绿色传奇八步沙》

□王明博

为了弘扬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的新时代愚公精神，再现三代人矢志不渝的传奇经历，生动诠释“两山”理论和书写脱贫攻坚的伟大创举，甘肃作家陈玉福深入甘肃武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历时3年，撰写完成了非虚构作品《治沙愚公——中国绿色传奇八步沙》（以下简称《治沙愚公》）。

《治沙愚公》以八步沙六老汉三代治沙人中的第二代郭万刚治沙为中心叙写了三代人的治沙故事，浓缩了半个世纪以来古浪农民的治沙史，彰显了农民治沙实践的智慧。从最初“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土办法到创新应用“网格状双眉式”沙障结构，从全面尝试高科技治沙造林等新技术到因地制宜培育沙产业、勇于探索发展生态经济，走出了一条“以农促林、以副养林、农林并举、科学发展”的生态之路。

《治沙愚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探索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致富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六老汉三代治沙人的先进事迹就是最生动的诠释。陈玉福以敏感的笔触捕捉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呈现了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陈玉福是一位有使命感的作家，近年来的创作紧扣时代主题，高扬时代主旋律，创作了电视剧剧本《建军大业》《热血军魂》等优秀作品。《治沙愚公》是陈玉福创作的一次转向，从宏大的军事历史题材转向了农村现实题材，从虚构创作转向非虚构创作，从历史叙事转向本土叙事。据陈玉福讲，《治沙愚公》的创作源于2017年，他看到了一篇报道《八步沙的树绿了，六老汉的头白了》，从一则新闻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3年多来，他多次到八步沙考察、访谈、蹲点体验，查阅古浪县历史、地理、风俗、灾害以及不同历史阶段防风治沙的相关文献，写出新时代农民的奋斗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在这伟大的实践中，演绎了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成了气象万千的社会景象，日新月异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家只要走出书斋，处处是创作素材。《治沙愚公》正是缘于此而创作的。

非虚构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但最忌为了追求事件的客观真实而堆砌史料，故事传播久远靠的是文学的审美特质。《治沙愚公》不是政策的解读，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去表现，叙事叙述张弛有度，情节感人，有很强的可读性。人物是叙事性作品的核心要素，事件是围绕人物来选择的，人物有血有肉，符合环境，符合性格成长，就会立起来，也就能打动读者。汪曾祺曾经说过小说就要贴着人物写。郭万刚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当代愚公”群像的塑造也是由郭万刚凝聚而完成的。郭万刚是供销社的一名普通职工，起初他的觉悟也并非崇高，参加治沙是迫于他父亲郭老汉的压力，他三番五次地想从治沙队伍中逃离，去兰州同学大林的公司。“黑沙暴”风灾是他思想转变的关键点，从沙漠与个体的关系转变为沙漠与群体的关系，升了他的思想。从艰辛植树到精细管护，林场有了效益，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由于政策的变化，一亩25元的造林补助的停发，再加上虫害的发生，一半的树木死亡，让集体林场走到了生死边缘。改变治沙思路“以农养林”，在沙漠中打井再次使林场焕发了生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科技的发展，第三代大学生郭毅等的加入，让治沙脱贫致富有了小机。从八步沙到更大更深的戈壁沙漠——黑岗沙，以郭万刚为代表的治沙人对治沙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沙漠和生态、沙漠和国家的高度。起起伏伏的治沙历程，曲曲折折的故事锻造了时代楷模的英雄群体。

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定是开放性的，有宽广的阐释空间。《治沙愚公》语言朴素，融合了古浪大量的方言俚语、贤孝花儿，穿插了社火表演、开井仪式等民俗现象，使作品不仅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上可圈可点，而且扩大了作品空间，丰富了作品的蕴藉性。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里下河文学的传统和未来

□周荣池

广袤的里下河平原素以“鱼米之乡”名世，殷实的市镇生活孕育了其丰赡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文学无疑是这个区域文化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特别是以汪曾祺为旗帜的里下河文学，聚集了一批创作题材、风格、审美相近的作家群体，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也成为区域文化发展中的一道风景。这些出生于此或者长期生活于此的作家们扎根在里下河丰饶的文化土壤，用文学的方式深耕乡土的价值，是一个有文化底蕴、有作家集聚、有学理支撑更有广阔前景的文学派别。

里下河文学有深厚的士绅传统。我们今天谈里下河文学，主要是以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大淖记事》为发端的，这是已经形成的共识。我们对汪曾祺及其作品的认识需要厘清的一点是，汪曾祺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士绅文化传统，其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是市井的，而非仅仅是片面的乡土文学。汪曾祺在《汪曾祺自选集》的自序中说：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从整个里下河地区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汪曾祺出生的高邮在宋代出现秦观所说的“所以生群材”文人群体，还是后来的泰州学派、扬州学派，里下河地区一直有着深厚的士绅传统。秦观、王磐、刘熙载、郑板桥、二王父子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平民，他们在文学文化上的创作也非普通百姓的底层吟咏。再从汪曾祺家族内部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汪曾祺的作为贵族的祖父，还是他上过新学会歌曲唱戏的父亲，也属于士绅子弟。这些文化氛围也正奠基了汪曾祺的素养、心性、风格。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化基因和文学传统，并非无本之木的野蛮生长。里下河平原作为典型的鱼米之乡，从新石器时期的“中华文明曙光”的龙虬庄刻文陶片开始，虽然历经海水进退和城市变迁但历代文脉不断，特别是明清以来一度作为经济中心所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成为里下河地区的文化根基与底气所在，而这也为汪曾祺这样的名家出现以及后来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做了充分的文化准备。地域文化底蕴的根本作用之所在是士绅传统在学养、风格和审美上的一种养成与传承，这让里下河的乡土即使人生清贫也不潦倒，遭遇变革而能自持，文化多元而有特质，这些从汪曾祺以及里下河地区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他

们的共性是从生活到思考的人性、人文、人本的精神内质。批评家黄玲在《关于里下河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思想与文学》中指出了里下河作家作品的几个共同点：比如那种整体上温柔敦厚、恬淡内敛的美学风格；比如专注日常生活，不约而同远离宏大叙事的默契；比如永远关注人和人的命运，热衷于挖掘人性，并对人性心怀悲悯。

里下河文学有集聚的作家群体。汪曾祺作为一面旗帜，其引领下后学的实绩积累是支撑起里下河文学的梁柱。从目前研究来看，里下河文学以其相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旗帜作为统领，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实力不凡的作家和作品。胡言实、夏翌勇、曹文轩、毕飞宇、贾梦玮、庞余亮、罗望子、鲁敏、刘仁前、刘春龙等一批被公知与公认的作家的作品扎根里下河平原肥沃的自然和精神资源，以文本的虚拟构造了一个真实而强大的文学世界。而随着里下河作家群体的逐渐庞大，众多优秀作品也陆续问鼎全国重要文学奖项，特别是毕飞宇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吴义勤、王干、朱辉荣获鲁迅文学奖，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被广泛认可的时候，总是带着籍贯与乡愁的地理标签，里下河无疑是他们创作上的精神出发地。与此同时，在里下河乡土上这个巨大地理与精神空间中，更有一大批里下河文学作家在用不同的文学样式，在成为巩固里下河文学实绩与地位的中流砥柱。谈及里下河文学大批的业余写作者，评论家何平认为：“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

里下河文学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一种文学现象或流派的形成，需要文本数量的累积和质量的标准，特别需要众多个体的自觉努力。在这种天然的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还需要理性的严肃梳理和规范引导，完全的“野蛮生长”会导致缺乏改善的勇气和自律，从而形成观念和技术上的模仿和重复。里下河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内形成规模与共识，这与拥有一批学养扎实、思想深刻、态度严肃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家有巨大的关系。吴义勤、丁帆、费振钟、王干、陆建华、汪政、何平、叶橹、王尧、温源亚、孙生民、周卫彬等评论家在研究作家作品、梳理流派以及引领写作风潮方面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里下河区域以外的学界，徐可、刘琼、舒晋瑜、郑润良、黄玲等一批理论研究者也高度地关注里下河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从内部自觉到外力关注从而推动地域文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与此同时，里下河地区所辖的县市也逐步参与了推动地域文学发展的实践，域内设立的地方性文学奖如汪曾祺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也为里下河文学形成文学自觉、思想共识和品牌意识发挥了巨大作用。

里下河文学有未来的广阔前景。文学是站在现实思考过往与古今的，而一流的文学作品是能够通过这种思考与梳理解决未来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里下河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活力与前景，那就是还有一批能够站在更广阔的地理疆域、养成更优越的精神品质、登峰更辽阔的汉语世界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得益于里下河河流既有良好的文学传统，也有积极的现代意识，从而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地域特色的核心价值以现代的手法智慧地融入了汉语世界。毕飞宇的《推拿》、鲁敏的《奔月》、朱辉的《七层宝塔》、义海的《西莱纳之歌》等等，这些作品如果隐退地域与作者身份，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地域的束缚，成功地打入共同认识与尊崇汉语文学世界，这是里下河文学的巨大胜利。这种胜利的意义在于，里下河文学毋须仅靠流派的身份识别而出场，这些作家和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乃至汉语写作领域都是一流的。他们的精神来源、故事素材、思考方式本源于里下河文化的滋养，但是他们在纸上营造的世界是一个全新视角的、充满精气神的也是能被广泛认可的世界。尤为可喜的是，这种现代意识的养成还在代际之间延续，苏若兮、陆秀荔、汤成难、费滢、汪雨萌、汪夕禄、龙羽等等一批新生代作家，以更为现代意识和书写，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用个性的创作实践，实现了里下河文学在城乡双重表达上的进步与收获。这种实践也暗合了学界对于里下河文学发展的期待，批评家晓华在《发现里下河文学的城乡观》中曾指出：“鉴于中国城市多样性的现代发展道路，里下河文学也应该充分地做好应对现代城乡书写的准备，因为任何一种居住空间的变革、人际关系的重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文化心理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在传统的城乡视角中找不到恰切的解释。就这一点，里下河作家群体已经在探索与实践的路上，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如同里下河农民数千年在土地上的耕耘，里下河文学领域的作家们也在用笔墨在大地上耕耘，这又是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深耕。这种以文学方式进行的耕耘对于保护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资源，构建地域的精神家园以及贡献当代文学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已经形成的显著现实效应，也将会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共识。